

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之举

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战略博弈

STRATEGIC RESTRAINT

IS NEW CHINA-US RELATIONSHIP POSSIBLE

赵明昊 著



战略克制

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人民出版社

STRATEGIC
RESTRAINT

IS NEW CHINA-US
RELATIONSHIP POSSIBLE

战略克制
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赵明昊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春

装帧设计：汪 莹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略克制：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 赵明昊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01-016903-3

I. ①战… II. ①赵… III. ①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8928 号

战 略 克 制

ZHANLÜE KEZHI

——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赵明昊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7-01-016903-3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王缉思*

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将正式就任第58届美国总统，美国内政外交将进入新的调整期。明年秋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这是事关中国国家发展走向的一件大事。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中美关系何去何从的问题正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研判中美关系的前景，需要对过去几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梳理，也需要对今后一个时期两国关系面临的核心挑战展开分析。赵明昊博士这本书即是为此而著。

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美是否会走向战略对抗，两国需要思考如何为中美关系构建一个新的框架。从2012年开始，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两国应探索构建避免对抗“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政策概念未得到美国官方的完全认可，但过去数年中美关系出现了哪些新特点新挑战、“新型”中美关系“新”在何处等一系列问题，的确值得探讨。本书从分析中美两国实力和大战略的变化入手，围绕

*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

双方重塑经贸关系、在“印太亚洲”的互动、应对“新型冲突”、培育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等重大问题，就如何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书中既有学理性的分析，也不乏政策研究的锐度，还有很多源于外交实务和智库交流的心得，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美关系的“脉动”和走向。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并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两军关系发展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但正是在过去几年中，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合作与竞争同时增强、国内因素对两国外交影响更大的“新常态”，双方关系仍呈现较大脆弱性和战略误判的风险。我认为，这种脆弱性和风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强烈反差。

首先，双方在经贸、人文、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加深，同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性增强，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近年来实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整，对中国加紧了防范、牵制活动。美国增加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军事演习和侦察活动，巩固其亚太安全同盟体系，拉拢一些同中国有领土纠纷或历史芥蒂的国家，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继续发展对台军事关系，无可避免地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是否要实施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的疑虑。两国军方或执法部门如在南海或东亚其他区域发生相互碰撞的突发事件，极易转为严重的战略对抗，直接影响两国内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冲击国际秩序。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加强这一趋势所得到的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大大多于中美关系中积极、正面的消息。这一反差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公众了解国内外形势主要渠道的趋势之下。更何况两国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宣扬有关对方国家和双边交往的“好事”，可能会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尽管中美政府高层保持着频繁、顺畅的沟通，交往气氛良好，但两国的民间舆论往往“不买账”，不断要求政府更加“强势”。在今年美国大选进程中，两党总统候选人争先恐后地保证在当选后

会采取更加坚定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经贸方面。这种国内政治背景和舆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美合作的实际效益，也加大了达成某些战略谅解的难度。中美关系中任何“一招一式”的不当，都可能引发舆论战和政治冲突。

第三个反差是战略思维层面的。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是最大的战略威胁，没有之一，据此很容易想象美国也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其实，从美国近年来的国家安全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实际外交活动、军事部署看，中东动荡、极端势力、暴恐活动、俄罗斯挑战，牵扯了美国的巨大精力。中国崛起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几大挑战之一，而且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往往不像美国面临的其他国际危机那样迫在眉睫。这种战略思维上的反差，容易使人夸大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现实地位，对美国（特别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的言论过于敏感，不利于中国更好地抓住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问题上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扩大合作面。从长远看，防止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应成为中国对美政策的重要目标。

上述三个强烈反差，并非自今日始，而是至少持续了十几年。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战略竞争性日益上升，社交媒体日趋发达，都促使上述反差更为强烈。此外，从本书中不难看出，在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中，规则之争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在政治领域，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即在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的国际体系中，以国家为单位实现民主化。美国则继续鼓吹巩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民主化”。这两大规则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经济领域，奥巴马政府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全球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试图制定或强化限制国有企业发展、提高劳工标准、信息自由流通、保

护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国际规则，其中有些（如歧视国企）是中国不能接受的。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参加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犹疑立场，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提出苛刻条件，对向中国输出高技术产品设置障碍，为维护美元主导地位而对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扩大投票权和人民币国际化态度消极，以国家安全审查为工具限制中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美发展。如此等等，都是试图“规范”中国内外经济政策和行为，树立和保护有利于美国的规则。两国经济模式互不兼容的一面，比过去更加突出。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人视南海为“祖宗海”，强调在南海等问题中的领土主权原则和权益，而美国人坚持说南海绝大部分海域为公海，强调“基于国际法的航行自由”。在这一规则争执的背后，是地缘政治之争。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视对方为威胁本国网络安全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两国的关注点很不一致：中国更多关切对国内网络的政治渗透，而美国关切“网络黑客”盗窃美国商业机密或攻击安全部门网站。

对于上述中美关系面临的若干重大难题，本书做出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并努力呈现两国战略界有关这些问题的辩论和主要观点，试图在此基础上寻求应对之道。2012年，我曾和美国的中國问题专家李侃如先生联名发表了《中美战略互疑》的报告，建议双方政府、智库和民间开展新的对话，以减轻相互的疑虑。我发现，4年过去了，当时所观察到的双向怀疑和不信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多、更深了。中国人担心，不管是谁2017年入主白宫，美国都会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牵制。美国人则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新形势表示不安或不解，担心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观念，对邻国、对美国都更加咄咄逼人。

由此，我很赞同本书作者提出的核心观点，即中美双方应当坚持一种“战略克制”的态度和方略，“需要深入地体认本国权力的有限性，更加精确

地界定自身国家利益而非盲目地追求‘绝对优势’，不以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彼此，同时都要对全球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性增加的态势保持足够警惕，共同确保国际秩序的平稳演进”。我认为，过去几年来，在相互理解、管控分歧、避免危机方面，中美两国政府是成功的，也有决心、有能力继续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在“新常态”下更需努力的方向，是把双方政府反复向对方阐明的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意图和合作意愿，向本国的公众说清楚，以减少舆论混乱的干扰，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我希望本书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赵明昊博士曾是我的学生和助手，虽然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从事国际问题的政策研究工作，但一直没有放松学术研究和写作，并积极参与学术界的各种活动。他的工作岗位使他对中美两国的政策制定过程相对熟悉，与国内外政界和智库人士得以深度交流，这些都对他的研究大有助益。我在本书中读到许多新意和创见，期待赵明昊博士能够不懈探索，做出更多、更优秀的成果。

2016年初冬于燕园北阁

目 录

绪 论 中美两国会走向战略对抗吗	1
第一章 美国：漂移的超级大国	22
第一节 美国在衰落吗	22
第二节 “特朗普现象”的背后	33
第三节 美国走向“韬光养晦”？	52
第二章 当中国走向全球	82
第一节 中国的发展成就与困扰	82
第二节 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	97
第三节 以“互联互通”为导向的大战略	115
第三章 中美经济关系的重塑	138
第一节 从“拥抱”到“脱钩”？	138
第二节 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154
第三节 TPP 与国际规则之争	172

第四章 “印太亚洲”与中美互动.....	189
第一节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189
第二节 美日同盟的转型.....	210
第三节 中美印“新战略三角”.....	229
第五章 从新型冲突到新型合作	250
第一节 气候变化.....	250
第二节 网络安全.....	259
第三节 海权博弈.....	272
第六章 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300
第一节 非洲与中美合作.....	300
第二节 “一带一路”与美国因素	314
第三节 阿富汗问题.....	331
余 论 国际秩序之变与新型中美关系	358

中美两国会走向战略对抗吗

当思考 21 世纪的全球政治图景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将是塑造未来世界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在短短 30 多年时间里，以年均 10% 的 GDP 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当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中国的 GDP 总量甚至比不上西班牙。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估计，以“购买力平价”（PPP）方式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近年已经与美国旗鼓相当，很可能在 2020 年左右完全超过美国。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智库则估计，中国会在 2018 年左右问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¹ 无论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抱有什么观点，只要不出现极为重大的突发事件，“历史的惯性”似乎真的会将中国带向“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最活跃的亚洲思想家之一、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过去 500 多年中国在上世界上陷入落后境地不过是历史的“偏轨”，依其幅员和人口等因素，中国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地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并不确定美国是否做好了成为“世界老二”

的准备。²

虽然上述预测普遍建立在线性发展的基础之上，有的看法甚至过于乐观，但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已使美国如鲠在喉，即便中国在人均GDP、民众生活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与美国仍有显著差距。人们开始非常认真地讨论在世界历史上已多次上演的宏大剧目：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崛起国后来居上，挑战一个长期占据全球霸主地位的守成大国。中国和美国会不会陷入战略对抗从而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美最终会不会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但注定不会有唯一明确答案的世纪之问！

距今 2500 多年前，古代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爆发战争。作为雅典精英阶层的一员和历史的亲身经历者，修昔底德写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修昔底德以来，冲突的逻辑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很多重要方面（如联盟与势力均衡）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著变化。

修昔底德到底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古代希腊，有很多城邦国家，其中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 5 世纪之初，曾联手打败了意欲侵占希腊的波斯帝国。到公元前 5 世纪中叶，不断壮大的雅典创建了环爱琴海国家联盟，而斯巴达则在伯罗奔尼撒本岛上领导着另外一个国家联盟。

正如同千年之后发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典和斯巴达之间

的战争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危机引发的。公元前 434 年，小国埃皮达姆努斯（简称埃国）发生内战，另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在埃国政治人士的请求下选择介入，这引起埃国前宗主国科西拉的不满。科西拉派出舰队直接占领了埃国，科林斯感到自己因此受到侮辱，于是便向科西拉宣战。

雅典和斯巴达密切注视着这场冲突，它们都不想过多卷入小国之间的麻烦事，但又都担心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因此受到影响。雅典人认为，科林斯和科西拉都是希腊的海军强国，一旦科林斯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海军力量，这将严重威胁雅典的利益和地位。雅典后来非常谨慎地采取有限介入的策略，但这仍然激怒了科林斯。于是乎，科林斯人跑到斯巴达那里诉苦求助，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拼命鼓动一直居于中立地位的斯巴达向雅典开战。

斯巴达人左右为难，但对雅典崛起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而骄傲的雅典人也拒绝了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公元前 431 年，战争爆发，直到交战 10 年之后（公元前 421 年），双方才达成了停战协议。然而这只是脆弱的和平，心有不甘的雅典采取了冒险政策，派兵攻打西西里岛，而这个岛上却有斯巴达的盟友。更糟糕的是，在征服西西里岛失败之后，雅典内部发生政变，寡头政治支持者推翻了民主派政权。而斯巴达人从一直希望击溃雅典的波斯人那里得到援助，在公元前 404 年战胜雅典。在内忧外患之下，雅典这一崛起力量被彻底击垮了。但斯巴达因为常年征战不断、国力消耗巨大，不久后便被另一个新兴的力量底比斯打败，其后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最终也不出人意料地走向衰亡。

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换言之，崛起中的大国总是会与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这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除了 20 世纪初期的英德冲突

以及后来的美日冲突，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也被分别比作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是民主和海权国家，后者则是专制和陆权国家，而美苏陷入一种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长期性、历史性大冲突之中。

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Graham Allison）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 20 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 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³的确，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要素，崛起和恐惧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图景的一部分。

借古喻今具有启发性，但常常也会出现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从而误导人们对当今事务的观察和理解。实际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最终爆发战争有着复杂的因素，正如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所言，“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与其说是雅典崛起这一现实，不如说是雅典崛起的特征”。⁴傲慢是希腊历史和文学的中心主题，雅典人建立了横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航海帝国，加之它们对于打败波斯人总是夸夸其谈，这让雅典的崛起看上去来势汹汹，从而极大加剧了斯巴达人的恐惧。

因此，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崛起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守成大国如何回应挑战，这些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在 20 世纪初，大英帝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德国的挑战，美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快速增强对于英国也是一种重大威胁。德国舰队隔着北海与伦敦三岛相望，且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试图在非洲与英国一争高下。与之相对，美国和日本与英国签署协定，向英国舰队开放通往北美和远东地区的航道，努力缓和与老牌帝国之间的敌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缘何德国的崛起中途夭折，并在一战后沦为英法等传统欧洲强国报复和欺侮的对象。当然，日本在二战期间疯狂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并最终遭受原子弹“灭顶之灾”，则是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此外，人们也常常倾向于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这种类比也是有严重缺陷的。美国和苏联当年分别领导着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它们各自拥有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美苏之间长达 50 年的“漫长和平”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核武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只占各自贸易总量的 1%。如今，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中国还是美国大多数盟国数一数二的贸易伙伴。中国并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美国根本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美苏关系带给中美关系的最大历史启示或许是，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表现和结果。⁵

如果要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寻求历史教训的话，仔细研究中美关系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许更有针对性。美国和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共同抗击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盟友，但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美国继续承认流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之间不仅因台海局势而陷入严重对抗的危机，还在惨烈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各自蒙受巨大损失。中美虽然一直在波兰华沙等地秘密举行大使级别会谈，但在美苏对抗的冷战两极格局之下，始终无法弥合彼此间利益冲突。直到 1969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出于拉拢中国应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考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缓和对美关系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两国关系开始“解冻”。⁶

经过三年多的反复折冲，中美两国决策层就共同应对苏联、越南甚至是日本问题达成妥协，并通过“战略模糊”方式在台湾问题上形成“权宜之计”。“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为了两国的战略利益，中美努力弥合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美国总统尼克松于 1972 年 2 月“越顶

日本”、成功访华，两国签署了 20 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文件之一——《上海联合公报》，带来“改变世界的一周”。⁷ 然而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 1979 年 1 月正式建交。

20 世纪 80 年代可谓中美关系的“蜜月期”，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后，两国关系陷入低谷。1995—1996 年，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国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 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 2001 年的“撞机事件”，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⁸ 此外，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美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等，也一直是造成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主要因素。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双方能够着眼大局、恪守底线，“斗而不破”，彼此都留有余地，努力避免“摊牌”，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在“不打不成交”的历史过程中，中美深化了对彼此国家战略、国内政治、政策手法的认识，也都能秉持一种基本共识：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民众的长远、根本利益。由此，中美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中美两国唯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这首先要求双方必须直面一个让人不快的现实：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在上升，人们开始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二

2013 年 7 月，皮尤世界民情调查项目发布的报告显示，与 2011 年相比，

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了 14%，至 37%；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度上升了 9%，至 53%。⁹ 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机，人们可以很容易听到两国政治分析人士相互指责的观点，其中不少充斥着深深的敌意和强烈的“必胜主义”情绪。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中国梦》一书作者刘明福认为，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中美两国的冲突都不可避免，这种冲突是与生俱来的，中美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一场“世纪对决”。¹⁰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激烈的安全竞争”。这是因为中国出于安全考虑，希望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把美国赶走。曾任副总统顾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称，中美关系即使暂时得到改善，但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之间必然产生摩擦，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也阻碍着信赖关系的构筑，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会逐渐转向强硬。¹¹ 美国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认为：“未来 50 年，美中两国将展开竞争，正如过去美国和苏联争夺盟友和全球影响一样。”近年来，美国国内智库围绕对华政策展开新一轮辩论，有些人认为加速崛起的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性威胁，是比俄罗斯、“伊斯兰国”等更为有力的对手，他们主张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制衡力度，将整体对华政策向“遏制”方向回调。¹² 此外，国际上“看衰”中美关系前景的声音也有所涌现，不少人称两国关系难以摆脱陷入“战略对抗”的宿命。

人们之所以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权力对比变化的影响，有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有谋取利益的考量。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认知常常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些时候，对一时一事的认知甚至会代替现实。“中美必然走向对抗”的念头很有可能会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2008 年或许会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中国在当年成功举办奥运会，成就了与世界大国身份相互关联的“百年梦想”。同年，起